

朱智賢全集

Zhuzhixian Quanj

第一卷 中小学教育与心理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



A102396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智贤全集. 第1卷, 中小学教育与心理/朱智贤著.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2

ISBN 7-303-05999-7

I. 朱… II. 朱… III. ①朱智贤(1908~1991)-全集
②中小学—教育心理学—文集 IV. B84—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4659 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出版人:常汝吉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90mm×1240mm 1/32 印张:23.5 字数:675 千字

2002 年 2 月第 1 版 200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 000 定价:50.00 元

序

林崇德

恩师朱智贤教授（1908—1991），字伯愚，江苏赣榆人。中国现代心理学家、教育家。恩师从教60载，其中40年（1951—1991）在北京师范大学从事教育科学，尤其是心理科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做到了鞠躬尽瘁！

恩师著作等身，更难能可贵的在于其开拓创新。记得1982年10月，杭州大学前校长陈立教授收到恩师的《儿童发展心理学问题》论文集后，给恩师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信中有这么一段话：“1949年后，我国心理学界能就一方面的问题，成一家之言者，实所少见。老兄苦心深思，用力之勤，卓著硕果，可谓独树一帜。”为了使恩师的学术思想永远留在人间，这是我们收集整理并出版《朱智贤全集》的动机所在。

出版《朱智贤全集》是社会的期望。社会上不少名家学者以及恩师的广大弟子，自《朱智贤教授纪念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后，尤其在《朱智贤传》（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后，纷纷来电和来函，希望《朱智贤全集》早日问世。足见恩师受人尊敬，影响深远，从中也能看出出版《朱智贤全集》的必要性。然而，一部全集的出版，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收集、整理和出版《朱智贤全集》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各级领导、各界人士和恩师的家属、亲属、生前友好的大力支持和热心帮助。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为了出好《朱智贤全集》，不仅耗费资金投入出版，而且费尽心

机，进行了多方案的精心设计。人民教育出版社为了支持出版《朱智贤全集》，十分慷慨，将该社出版的《儿童心理学》等恩师著作的版权无私地提供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的师生，为了寻觅恩师的零散文章，到处奔波，从竖排到横排、从繁体字到简化字的处理、校对工作费尽了精力……对于所有这一切，我是无限感激的。在此，请允许我对在全集的收集整理出版工作中付出努力的所有人们一并致以深深的谢意！

当然，全集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这里收集的六卷为：《中小学教育与心理》、《教育研究与方法》、《心理学基本理论问题》、《儿童心理学》、《思惟发展心理学》、《儿童心理学史》（这后两卷尽管是恩师与我的合著，但主要体现的是恩师的学术思想，应该收集在恩师的《全集》之中）。但《全集》不可能收齐恩师的全部论著，至少未收录上他为别人作的序、前言、公文、译著和重要书信等，更不会有主编的著作和工具书。这只能留为遗憾了。

1991年3月5日恩师逝世，我代表自己和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当时的师生写了两条挽联：

“师如父胜于父传道终生精心栽培沐春雨，恩如山高于山流芳千古遗志继承慰英灵”；

“学识贯古今斗室耕耘著作等身传不朽，师谊如父母教坛授业恩深似海艺煦风”。

这两条挽联体现了恩师与我的关系，表达我对恩师的深情。出版《朱智贤全集》是作为我——恩师的忠诚弟子的愿望。《朱智贤全集》马上要问世了，我的心情因而平静与轻松了许多，我会在接受广大读者对全集的意见中，承担《朱智贤全集》出版中不足的全部责任。

恩师千古！

2001年国庆于北京师范大学

现代教育家、心理学家朱智贤

庄永龄

生活中，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体会，在你度过的时日里，总有那么几天，你叫它为“闪光的日子”，它是你一辈子都忘不了的，是你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日子。这种“闪光的日子”往往分布在你一生的几个重要阶段，成了你生活、工作、政治生命的里程碑或转折点。

1979年的除夕，对于著名的儿童心理学家朱智贤教授来说就是这种“闪光”的一天。他刚刚参加了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党总支召开的新党员宣誓大会。在这个会上，他举起手，含着激动的泪花庄严地向党宣誓，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在过去的几十年的时间里，无论是顺利的时候，还是处于逆境，他都矢志不移地追求着这一天的到来。

寒冬腊月，道路两旁的柳树，叶子早就掉光了，只有细细的柳丝长长地垂着，现在让北风吹得上下翻舞。然而，朱智贤教授却没有一点寒意，相反，他的心里充满了春天的气息。他觉得有股热流在身里流动。是啊！入党虽说是自己一生的追求，但是这一天绝不是前进的终点，而是自己重新迈步的一个起点，他决心以垂暮之年为党的事业再立新功。还有多少事需要干呀，他不知不觉地加快了自己的步伐。望着这条熟悉的道路，他微微一笑。三十多年了，春日里这路上纷纷扬扬的柳絮，秋天里这路上零零落落的黄叶，都是他生活的见证。多少个春秋啊！他踏着这条路去给学生上课，有多少个日子，他踏着这条路去接受批斗、指责。在这条路上，有他轻快的脚步，也有他沉重的足迹。这里记录着他一生坎坷的遭遇。



1908年12月31日，朱智贤教授出生在江苏省赣榆县城内一个城市贫民的家庭。朱家本是山东人，因为饥荒，曾祖父携儿带女逃到了江苏赣榆县里。一家老小辛辛苦苦地开了一小片荒地，指望靠它过日子，谁知当地的土豪又把这块荒地占领了。没办法，一家只好流浪到县城里，好不容易，祖父总算在县学府找到了一份杂差。每当科举时，他就成了报榜的信差。父亲在县城里做小买卖，卖点糖果、杂货，以维持一家的生活。日子虽然清苦，但是生活总算安定下来了。也许是接受了生活的教训，感到不识字不行，也许是祖父年年为别人报榜，而自家却满门白丁，受到刺激的缘故。父亲在朱智贤6岁时就送他到县里的初等学校（当时叫洋学堂）去读书。上学前，父亲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好好念书，为朱家争一口气。父亲的人生哲学很简单、朴实，就是要凭良心做人，要凭本事吃饭。这个思想支配了朱智贤的整个童年时代。

带着父亲的教导，他进入初等学校后，学习非常用功，成绩优异。当时县城里有两所小学，一所初等小学，一所高等小学。朱智贤在初等小学读了四年后，又考进了高等小学。那时候能上学的差不多都是有钱人家的孩子，他们瞧不起朱智贤。不过这并没有使他灰心丧气，相反促使他更加勤奋。他记住父亲的话，要为朱家争一口气。他的学习成绩都是甲等。当时，教他们的级任老师姓宋，是个师范毕业生，课余经常爱讲些新鲜的思想给学生听。他很喜欢朱智贤的才能。他鼓励朱智贤去探求学问。

然而，升学的道路并不平坦，当朱智贤高小毕业时，父亲执意不让他再上学了。他认为谋生的本事有高小的文化已足够了，再说继续上中学，家里也供不起呀！父亲要送他去当学徒学手艺。宋老师听到这个消息后，深为他不能继续升学而感到惋惜，这岂不埋没人才！他登门拜访朱智贤的父亲，耐心做说服工作。父亲让步了，同意他继续上学。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宋老师带着朱智贤及其他几位同学到离

家120里路的灌云县去报考江苏省第八师范学校。上师范学校，不仅可以免交学费，学校还发膳食费和一套制服。这对穷苦家庭的学生来说，实在是个很好的去处。结果，朱智贤和另一名同学被学校录取了。

师范学校不仅给他提供了学习的机会和条件，而且使他接触到了教育学、心理学。一些著名的外国教育家像瑞士的裴斯塔洛齐、德国的福禄贝尔……等的思想启迪了他，使他对儿童心理学、教育学产生了浓烈的兴趣，决心像他们一样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儿童的教育事业。这是朱智贤走上研究儿童心理学、儿童教育道路的一个起点。

朱智贤还遇到了一位好教师。他叫吴铁秋，原是位秀才，后来读了不少新书，接受了一些民主主义革命的新思想，在当时的教师中他还是思想比较开明的一位。他的教学方法也很独特，强调学生自学，培养学生独立钻研的能力。他要求学生买两部书，一部是《诸子精华录》，一部是当时出版的新书《百科小丛书》，然后让学生自学，定期写读书笔记、日记，交给他批阅。这种教学方法把大量的时间让给学生，使学生有时间学习各种知识，既培养了学生的自学能力，又锻炼了他们的写作能力。后来，朱智贤教授在回忆这段生活时，常说：“师范学校的几年学习给我打下了扎实的知识基础，培养了我的自学能力和写作能力。”学习两年后已有不少学生可以写文章在报刊上发表了。有的写考证《西游记》、《镜花缘》等书的论文，有的开始写童话、小说。朱智贤这时也开始写一些儿童诗歌、童话，在当时的《小朋友》、《儿童世界》、《少年杂志》等刊物上发表。当时他的想法是挣点稿费以减轻家庭的负担。他从自己上学的亲身经历中，深深感到穷苦人家的孩子上学是不容易的。因此，在师范毕业的前一年，他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热心地为学校附近街道的失学儿童办学，并试行了当时流行的“设计教学法”。教学实践使他获得一些感性的知识，再加上读了一些外国教育家的著作，他把自己的兴趣逐渐集中到研究儿童教育上面。他开始写一些教育和心理学的论文，如《中国学校教育的新生命》、《师范生实习问题》、《怎样讲故事》等等，在《中华教育界》、《小学教育》等刊物上发表。他开始从儿童心理的角度对

有关教育的问题发表意见。1928年，也就是他师范毕业之前，就搜集资料写了《儿童字典的研究》一文，后来他当小学教师时又作了一些修改补充，1930年发表在中华书局编的《中华教育界》杂志上。这篇文章可以说是他在师范学校读书时所写的有关教育方面论文的代表。

在这篇文章的开头，他就提出：“我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问题？这完全因为感到了实际的困难。我和许多小学教师谈到这个问题时，总是疾首蹙额的：‘什么时候书局里能出一本完全适用的儿童字典呀！’的确，目前各书局出的字典不能算少，可是能对于儿童很适用的，简直寥若晨星。”接着，他在文章中指出了当时的字典从查字方法到解释都是从成人的要求出发，解释多是文言文，同时字典的字体大小、标点、插图等等都不适合儿童使用。他认为儿童字典解说用的语句要适合儿童的经验 and 想象。要使儿童一看就懂。例如，解释“犬”字，旧字典是“犬，哺乳动物之一也。”若是解说为：“犬是家里养来在夜里看守门户的”，儿童可以一看就懂。他在这篇文章中还指出：使用儿童字典可以养成学生自己解决问题的习惯，增长儿童的知识，以及训练读音准确等功用。当时，这是一篇比较全面的从儿童心理的角度研究儿童字典的文章。

在师范学校时，他对教学方法的研究也很感兴趣。临毕业前，他发奋要写出一本书。中学生要写书，当时有人讥笑他，也有人说他太狂妄了。但是他很坚决，立志要写成。他除上课之外，整天埋头在学校的图书馆翻阅资料和写作。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成功了，写出一本《小学历史教学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朱智贤高兴极了，老师、同学也都祝贺他。书的出版也更加激励他去研究儿童教育的问题，书的出版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他的经济困难。他收到了85元的稿酬，当时对他来说，已是一笔很大的钱了。

1928年，他师范毕业了。由于在学习期间就常有文章在报刊上发表，还出版了一本书，他在学校可以说是小有名气的了。他的毕业成绩优异。学校把他留了下来，在母校的附属小学任教（此时改名为江苏海州中学实验小学）。他担任四年级的班主任兼儿童自治指导主

任。

在小学的教学实践使朱智贤有机会和儿童在一起，亲自去体验一些教学方法的效果和儿童的心理特点，为他深入地研究儿童心理学和儿童教育打下了必不可少的感情基础。他继续广泛地涉猎各方面有关儿童教育的材料。他自己试编过语文教材，试行儿童自治教育。他修改和写作了一些有关儿童教育的文章和书，先后出版了《儿童诗歌集》、《儿童谜语集》、《儿童自治概论》（中华书局出版）、《小学课程研究》（商务印书馆出版）等书。

二

工作、研究都在正常地进行，但是朱智贤这时心里渴望的是能到高等学校去继续学习。机会终于来了。1930年，也就是他在海州中学实验小学任教两年的时候，南京中央大学有条规定，凡是江苏省各中等学校取得最优秀成绩的毕业生，可以免费保送到中央大学学习。他的母校准备保送朱智贤进大学学习，这对贫穷家庭的孩子来说，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朱智贤非常高兴，回家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他父亲沉默了一会儿，望望儿子那热情期待的目光，叹了口气，他细细地和儿子盘算起来了。如果上大学，虽说可以免交学费，可是当小学教师的薪水没有了。上学期间吃饭、穿衣、文具书籍等费用就要靠家庭负担，一年少说也要四百元左右。很显然，靠小买卖过日子的家庭怎么承担得了这笔费用？父亲表示反对。上师范时的同学都支持他上大学。他反复考虑，最后和父亲达成了一条协议。上大学期间，朱智贤不再帮助家里维持生活，但上学的各项费用家里也不管了，靠自己想办法。就这样，朱智贤从苏北的赣榆县来到南京中央大学教育系学习。当时中央大学教育系有一批著名的教育学和心理学的教授，如我国第一部儿童心理学《儿童心理之研究》的作者陈鹤琴、著名教育心理学家艾伟、教育理论家孟宪承等。

朱智贤就像蜜蜂飞进了百花园一样。他勤奋地采集、吸取各方面的知识。知识扩展了他的眼界，知识打开了他心灵的窗户，改变了他

的人生观。大学里教育哲学课由孟宪承教授主讲。他详细地介绍了世界上哲学思想的各个派别。既介绍了唯心主义、实用主义，也介绍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基本规律。这是朱智贤第一次接触到辩证法。它是那么有吸引力，朱智贤感到十分兴奋。与此同时，他也贪婪地阅读了当时刚出版的李浩吾（即杨贤江）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的《新教育大纲》，第一次接触到辩证唯物主义的教育学。父亲灌输给他的“凭良心做人”的观点动摇了，他逐渐弄明白了一切事物都是在发展变化的，良心也一样，各种人对“良心”的看法也都不一样。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社会的现实使他看清了只有革命者才是无私的，才有真正的良心。这点对他以后选择什么样的道路，怎样对待周围的人和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时间是多么的珍贵。朱智贤一面要学习大学的课程，一面还要为生活的费用奔波。他到中小学校去兼课，给报纸杂志写稿或翻译文章。那时候，他除了上课和到中小学兼课外，余下的全部时间几乎都是在学校图书馆里度过的。他悉心地钻研问题，查文献，翻资料。每学期他都要写一本小册子出版，靠稿费使自己能在大学继续学习下去。

勤奋给他带来了成果。大学四年级的时候，他又完成了一部 30 万字的《教育研究法》，由正中书局出版。这本书被许多大学的教育系列为教学参考书。讲到参考书，朱智贤曾遇到一件有趣的事。在大学四年级时，学校开了一门课叫“课程论”，由一位姓王的老师讲授。这位王老师上第一课时就给同学们开列了一批参考书。当写到《小学课程研究》这本书的作者朱智贤时，同学们都转头看他。老师莫名奇妙，一问才知道原来朱智贤就在班上。

他还相继发表了一些教育学和心理学方面的论著，如《小学学生出席与缺席问题》、《小学行政新论》等等。

由于学习成绩优秀，在学习期间就发表不少文章，所以在临近大学毕业时，朱智贤接到了厦门集美师范学校的聘书，请他当研究部主任兼教育学、心理学的教师。

1934 年，26 岁的朱智贤大学毕业后就南下到厦门集美师范学校

当研究部主任了。在这期间他还主编了《初等教育界》、《儿童导师》两种儿童教育刊物。

1935年，朱智贤中学时的教师董谓川约请他到山东济南市担任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的编辑部主任，主编《山东民众教育月刊》和《小学与社会》两种教育刊物。这期间他还编写了《民众学校实施法》、《通俗讲演实施法》等书。

这时，有不少朋友鼓动他到国外去学习。当时到国外学习手续比较简便，朱智贤自己也很想到国外了解一下教育学、心理学的研究状况。因此，1936年春天，朱智贤28岁时，他辞去了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的职务，到日本留学去了。

到日本后，他进了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大学院，在教育学研究室作研究员。在这里他翻译了日本野上俊夫的《青年心理与教育》，编写了《小学研究工作实施法》一书。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期间，日本报纸大量报道了事变的情况。朱智贤从报道中看到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存亡为重，正确地解决了“西安事变”。他对共产党开始注意起来了。他看到日本街头有马克思、列宁的书籍出售，就买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回来认真地研读。这是他第一次读《资本论》，从这里他懂得了什么是剥削，学到了用辩证唯物论的方法分析问题。他也试着用辩证唯物论的方法去分析一些社会现象。回忆在日本留学这段短暂的时间，朱智贤认为最大的收获就是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著作。

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朱智贤从日本搭英国轮船回到祖国。当时，整个社会动荡不定，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我中华民族的领土。苦难的人民家破人亡，四处逃难。朱智贤先在上海，后来到武汉，以后又到了山城重庆，在重庆女子师范学校教了几个月的书后，他接到了江苏教育学院的聘书。这时江苏教育学院已内迁到广西桂林。1938年朱智贤从重庆到达桂林，在江苏教育学院担任教授。他

讲授的课程很多，有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儿童心理学、教育学和教育史等。

抗战期间，桂林是一个进步力量比较集中的地方，许多热血青年、进步人士、进步的文化工作者从各地来到桂林。当时一些地下党员，如刘季平、程今吾等等都在这里活动。朱智贤由于在日本时已读过《资本论》，接受了一些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因此，在讲课时，他就运用这种观点去分析儿童教育和儿童心理的一些问题，尽管现在看来是十分肤浅的，但在当时，这种讲授方法是很受同学欢迎的。他和程今吾等一些共产党人以及进步人士共同组织教育座谈会，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探讨研究教育学和心理学问题。在和进步青年及进步人士的接触中，朱智贤开始接受党的影响。当时，在桂林可以找到一些马列的著作，他就一本一本地研读。他还到中苏文化协会主办的俄文夜校学习俄文，主动参加一些进步学生组织的读书会，大家一起畅谈读了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体会。这些活动使他逐渐了解中国共产党，他听到了中国共产党担起拯救中华民族危亡的大任，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浴血奋战、英勇斗争的事迹后，感到无比激奋。这也进一步促使他更积极参加一些进步活动。在这期间，他写了《教育是什么》、《一个教育定义的商榷》、《心理学上三个行为公式之批评》、《论人性的改造问题》等。从文章的主题就可以看出，这时朱智贤看问题的方法已和以前不同了。他开始重新思考过去的一些问题，试图用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去探讨教育学与心理学的理论。

桂林毕竟不是解放区，朱智贤参加一些进步活动引起学校当局的注意。学院的院长找他个别谈话，警告他不要跟着共产党走。学校的训导主任还跑到宿舍检查，当他发现书架上的马克思著作时，就阴阳怪气地对朱智贤说：“你看看，你的书架上都是些什么书？你为什么要读这种危险的书呢，你想往什么路上走！”朱智贤严肃地回答：“往正道上走！人各有志嘛！”训导主任惊讶地呆呆看着朱智贤，他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的答复。他装模作样叹口气说：“你何必呢？”朱智贤答：“凭做人的良心。”训导主任转身走了。是啊，早年父亲就教育朱智贤要凭良心做人，现在他已完全明白了只有革命者才有真正的良

心。

朱智贤的行为激怒了反动的学校当局。1941年皖南事变时，学校把他解聘了。他住到朋友家里，依靠写一些教育和心理学方面的通俗读物维持生活。他先后出版了《青年心理》、《心理常识漫话》等书。

这时，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进步人士的迫害，桂林的形势恶化了。经朋友的介绍，朱智贤从桂林进四川，到四川教育学院任教。1944年2月又离开四川到广东中山大学当教授，讲授教育学、教育心理学、儿童心理学、普通教学法等课程。当时，中山大学辗转在广东的西北部山区，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才跟中山大学一起到达广州。

1946~1947年，广州的青年学生举行反内战、反饥饿的示威游行。朱智贤支持和参加了学生的进步活动。1947年5月反动的学校当局在朱智贤的聘书尚未到期的情况下，就把他和钟敬文、梅龚彬等五位教授一起解聘了。并策划进一步对他们进行迫害，这时，继续留在广州已有危险，朱智贤只好离开广州到了香港。香港的地下党组织安排他去达德学院。当时达德学院是党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合办的。学生主要是两部分人组成，一是南洋来的，二是国内受到迫害逃出来的青年学生。当时，章乃器、邓初民、侯外庐、胡绳、杜国庠等都在这个学校任教。朱智贤在学校任教授兼教务长。教心理学和教育学。同时兼任生活教育社主办的中业学院院长（郭沫若同志任董事长）。这时在香港的地下党员冯乃超和黄焕秋经常和他联系。

经过这段革命活动的实践，朱智贤对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立下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决心。于是他向当时在达德学院经济系当主任的共产党员杜国庠提出了入党的要求。

但是，这时达德学院的活动也引起了香港当局的恐慌，1949年2月香港当局无理地封闭了达德学院。地下党组织正准备让大家到东江（曾生同志领导的东江纵队所在地），这时北平解放了，在党的关怀和邀请下，朱智贤与各方面的人士一起乘外轮经天津到达北京。他开始了新的生活。

四

到北京后，党先组织他们学习和参观。然后让朱智贤和钱俊瑞、柳湜等一起参加“中华全国教育工作者协会”的筹备工作（后来因为教育工作者划为工会会员范畴，而停止筹备工作）。这时全国已临近解放了，中央为了解决全国学校教科书和教学用书问题，就在当时董必武任主席的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设立一个“教科书编审委员会”，负责这件事，并请叶圣陶任主任委员，胡绳为副主任委员，朱智贤被任命为委员，同时兼教育组组长，负责中等师范学校、高等师范学校的教育学、心理学教学用书与教育参考书的编审出版工作。

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朱智贤改任为中央出版总署编审局副处长兼教育组长。不久出版总署撤销，他又改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副总编辑。这时他才42岁，由于工作紧张，他咯血病倒了，进了医院。经医生检查是肺病，当即决定动手术切去病变部位。手术后朱智贤的身体十分虚弱，已不能适应繁重的行政领导工作了。他的老朋友林励儒教授（此时他被任命为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常来看他，劝他到北京师大工作，这样可以一边休养，一边进行研究工作。就这样，1951年他改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讲授普通心理学和儿童心理学，以后并兼任儿童心理学教研室主任、心理教研室副主任等职。

这时朱智贤43岁，虽然身体比较虚弱，但他还是决心要在心理学，特别是儿童心理学的理论方面进行探讨。1956年他的健康情况有了好转。他被邀请参加了我国12年科学远景规划的拟定工作，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亲切地接见了他们。党号召大家要向科学进军。当时，朱智贤真是心潮澎湃，异常兴奋。他觉得自己在心理学的理论研究上有一定的基础，他准备向心理学进军。他回顾过去，虽然也写了几本书，但都比较零散，这也是受当时社会条件所限制。抗日战争时期社会不稳定，怎么可能安心进行研究呢？现在，党为我们创造了这样好的条件，不干还等待何时？他读了许多苏联有关心理学研

究的书籍和文章，并和其他同志合作翻译成汉语出版，像斯米尔诺夫主编的《心理学》，彼得罗夫斯基主编的《心理学》，沙尔达科夫写的《中小学学生心理学概论》等等。他还参加了我国中等师范学校的《心理学》、《教育学》课本的编写工作。他像跌倒的运动员一样，爬起来后奋力追赶，要补回丢失的时间。他恨不得要把生病时失去的时间统统夺回来。他准备在研究儿童心理科学的道路上疾跑。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也没有忘记自己的追求。他向党组织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

正当朱智贤信心十足，准备大干一番的时候，灾难来临了。1958年在“左”的路线的影响下，北师大开展了批判心理学的运动。他首当其冲，被插上“白旗”，定为“资产阶级分子”。人们从他的文章中断章取义地摘出几句话来进行批判，无限上纲。完全否定了解放以来心理学、儿童心理学的成就，心理学、儿童心理学从此陷于万马齐喑的局面。他也沉默了，但他对自己说：“要相信党，相信自己。”

1959年夏天，各地报刊重新恢复了心理学领域中百家争鸣的讨论，1961年党为心理学恢复了名誉。紧接着1962年初，全国召开了高等学校教材的编写会议。周扬主持了这个会议，他点名要朱智贤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编写一部《儿童心理学》。朱智贤接下这个任务后，就立即开始了紧张的工作。他不顾自己肺部做过大手术，并有高血压症，夜以继日地进行工作。4月份教材编写会议散会，他6月就完成了《儿童心理学》上册的书稿。到秋天，下册还未写完时，他已经支持不住了，他累得晕倒过去，被大家送进了医院。他就是以这种拼命的精神，高效率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这部30多万字的《儿童心理学》是他心血的结晶。这是我国第一部贯彻马列主义观点，吸收国内外科学成就，能够体现我国当前学术水平的儿童心理学教科书。在这部书中，朱智贤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探讨了儿童心理发展的基本规律，正确地阐述了遗传、环境和教育在儿童心理发展上的作用。他明确地指出：“遗传素质是儿童心理发展的生物前提、自然条件，

没有这个条件是不行的。”^①但是遗传只是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决定的条件。“儿童心理发展是由儿童所处的环境条件（生活条件）和教育条件决定的。”他又进一步分析说，环境和教育虽然是儿童心理发展的决定性条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可以机械地决定儿童心理的发展，因为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儿童心理发展主要是由适合于儿童心理内因的那些教育条件来决定的。”他清楚地阐述了先天和后天的关系。“先天的遗传对一个儿童说来，只能提供发展的可能性，而不能决定发展的现实性，决定发展现实性的则是后天的环境和教育，而教育则起着主导作用。”^②在书中他还指出：“儿童心理发展也跟一切事物发展一样，是一个不断矛盾统一、量变质变的发展过程。”总之，朱智贤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探讨了儿童心理发展过程中先天与后天的关系，内因与外因的关系，教育与发展的关系，年龄特点与个性特点的关系等重大的理论问题，为建立我国马列主义儿童心理学奠定了基础。这本儿童心理学教科书，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评价，对培养我国儿童教育学、心理学的专业人才和科学研究工作都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正当朱智贤对许多问题还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的时候，十年动乱开始了。不加分析、不顾事实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朱智贤被戴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拉出去批判、斗争。心理学被宣布为资产阶级的“伪科学”，心理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下马了，研究人员失散了。他被迫去接受劳动改造，心理学、儿童心理学濒临毁灭的边沿。

这时候，朱智贤已经进入花甲之年了，他感到痛心，然而又无可奈何。造反派勒令他一家七口人挤在两间屋里。十几年辛辛苦苦搜集来的书籍、资料都零散地堆在地上、床下。望着这一堆堆的书，勾起他回忆自己一生在研究儿童心理学上的坎坷历程，时间是有限的啊！他已从中年进入老年了，还能再做什么呢？他摸了摸这些书，终于横

① 朱智贤. 儿童心理学.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1. 2. 11. 12. 83

② 朱智贤. 儿童心理学.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1. 2. 78. 87

着心全部卖光了。望着书拉走后，他心理突然觉得少掉了一大块东西，他真想大哭一场，然而他哭不出来。就这样，十年，整整十年，心理学、儿童心理学的研究处于停滞状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实行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措施，心理学家枯萎的树苗又得到了雨露的滋润，枝叶又舒展开了。心理学、儿童心理学的研究工作又开展起来了，它重新走上了繁荣的道路。朱智贤也恢复了自己的研究工作。1978年夏天，在杭州举行的中国心理学学术专门会议上，他不顾年老体弱，作了长达六个小时的有关皮亚杰心理学思想评介的学术报告，受到热烈欢迎。1981年秋天，北京师范大学建立了心理学系后，朱智贤担任了心理学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兼副系主任。他又开始了自己的拼搏。

朱智贤一面继续自己的研究工作，一面带研究生，他要为我国心理学研究培养后继之人。1979年，他发表了几篇介绍苏联及西方儿童心理学研究的情况，总结我国30年来儿童心理学研究状况的文章。1981年春天，他应邀参加了美国儿童发展会议，在耶鲁大学心理系做了关于中国儿童心理学的报告，并参观访问了九所大学的心理学系和儿童发展研究中心。

1982年，北师大建校八十周年时，朱智贤把自己在师大工作30多年来发表的一些文章汇集成《儿童发展心理学问题》一书出版。他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说：“回顾解放后30余年，心理学也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特别是1958年以来，由于左倾思潮，心理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受到很大干扰。很多自己有兴趣的课题，常常不得不忍痛放弃。”“可以庆幸的是，1976年拨乱反正以来，心理学不但恢复了元气，而且也在新的起点上蓬勃向前发展。70几岁的老人，目睹这种情况，喜悦兴奋的心情，是难以笔墨形容的。可是时光不等人，心情虽然还像青壮年，但毕竟老了，体力精力给自己的工作以不小的限制。虽然克服了困难，做了一些像补课一类的工作，但内心总不免有些遗憾。常常想：如我还是青壮年……”这段话是他内心的自白，他经常说：“我抓了一切的机会工作，虽然年龄、精力不行了，但我没有偷懒。”事实也是如此。1983年，他为我国培养出第一位教育学博